青年学者圆桌讨论·贯通的清代政治史

适度地以现代范畴与历史对话

李欣然

在现代分科设学的学术语境下，史学研究者的思考常要顾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包括史学下各细分门类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时会被学生提问：对于同一人物（比如鲁迅）的研究，史学和文学、哲学的处理是否有区别？对于同一研究对象（比如胥吏），从政治史、社会史进行史学研究，和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有何不同？[①]作为入门者的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特别能体现现代学科分隔所带来的对理解过去的基本困惑。进而言之，当我们在用政治、经济，包括诸如宗教、舆论等现代范畴理解历史时，都需要注意现代与历史之别的影响。

现代分科设学带来的界限区分，包括现代范畴对史学的影响，可以是海妖塞壬迷惑心神的歌声，但也完全可以是帮助攻陷耶利哥墙的号角。在把握好“度”的同时，如何适当地利用现代的区分和范畴与历史对话，可以体现身处21世纪的人对历史和学术的特别理解方式。而以青年学者的身份讨论这个议题，与其作宏观抽象的综括，我更愿尝试像串贝壳项链一样把一些平时的阅读和思考贯连起来，通过具体问题的简述来贡献一偏之见。

一、现代概念区分与历史整体性

首先仍需着重“适度”的意义。现代的区分和范畴不完全能涵盖历史的样貌，不能简单地以今度古，这是史学家基本的审慎。因而我们在讨论清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时，都须意识到所谓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和清代历史大部分时间里的人对自身语境的认识存在不同。刘志伟反思经济史研究需要“走出形式经济学”，即因我们今天在谈及“经济”和“经济学”时，其实已赋予它们特定的现代含义。而当以“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经验性事实中建立起来的概念范畴”理解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史时，不可避免面临“经济学规范理论与中国经济史事实之间的矛盾”。[②]今天越来越多学者有类似的自觉。以我自己从事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为例，现在一流期刊上诸如“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之类的选题似相对少见了。自然不是说完全不能研究，而是说我们越来越注意到需要关注古人自己是用什么范畴、什么理解去处理被我们称为“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东西。

[收稿日期] 2023-10-31
[作者简介] 李欣然（1986— ），男，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4，lxrcn@126.com

① 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学科差别主要在最终关怀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但就理解研究对象而言则不应有学科界限，一切有助于此的学科和方法都是有用的。

② 刘志伟：《传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需走出形式经济学》，《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但类似的区分仍会不时影响我们对历史整体性的把握，也因此需要我们经常有所警惕。以一个具体问题为例，八旗生计是一个特别能体现清代特殊性的问题，它既关乎军事，又是重要的财政问题，还涉及满洲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天的理解中，这三个领域各有其逻辑，因此我们很容易把这个问题“打散”到军事、财政、政治文化等不同的细分论域里。但这样恰容易遮蔽该问题在这些领域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具体言之，今天中外的清史研究都重视清朝如何调动汉族儒家、藏传佛教等多种文化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但我们不能忽视军事上“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对清朝统治的意义，① 它和清代“大一统”密切有关。清朝的军事开拓既有维护边疆安全、统治者好大喜功等现实的、个人的原因，但多大程度上又和清朝需要不断“论证”其“以武功定天下”的合法性有关？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②

“武功”对清朝的特殊意义特别体现在“我朝养兵之费甚于历代”，③ 这里面就包括了体现满洲统治特殊性的八旗生计仰资于军费支出。八旗“二百余年，生齿日繁”本身就是“本朝厚待勋戚，谊重亲亲”的自然结果，可以说本应是清代仁政的表现。④ 而随着晚清国家财政困难，八旗生计成为朝野热议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财政的争议关系到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八旗经费“节则节矣，如亲亲之谊何”，⑤ 正体现了二者的冲突。而之所以议裁旗兵经费，又和其在晚清“不能战”的军事原因有关：

> 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藿少。⑥

这个问题还更深远地关联到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后人惯说鸦片战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这种说法暗含一个有待厘清的理路，即抵御“夷人”的军事失败，或也对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的合法性造成冲击。如薛福成所说：“圣清御宇，余二百年。凡磊落宏伟盖世之勋业，皆出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之隶旗籍者。汉臣虽不乏贤俊，不过以文学议论黼黻隆平而已。先皇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⑦ 但也正因此，军事上的失败会给汉人以“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的不满。⑧ 近代西方的军事冲击固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它如何动摇了以“武功”为重要合法性基础的清朝统治，是需要关注的。

可以说，八旗生计是一个横跨军事、财政和政治合法性诸领域的问题，它以财政方面的具体表现显示了清朝“以武功定天下”的统治合法性在军事能力下降后遭受的重大挑战，对我们理解清代的统治及其晚期衰落问题关系极大。单纯军事、财政或政治合法性的讨论，都无法涵盖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适度使用现代范畴，需要警惕后世的区分和界限会掩盖历史的整体性和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96 页。该上谕即对八旗“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之命令。

② 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第 4 章“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22–167 页；卫周安：《清代战争文化》，董建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洋务运动》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525 页。

④ 詹事府左中允文焕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第 5 册，线装书局，2008 年，第 2159 页。

⑤ 刑部主事鲍琪豹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廷签议〈校邠庐抗议〉档案汇编》第 16 册，第 6985 页。

⑥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上《节经费议》，冯凯整理：《校邠庐抗议汇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年，第 67–68 页。

⑦ 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5 辑，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543 页。

⑧ 魏源：《古微堂诗集》卷 9《寰海》，《魏源全集》第 12 册，岳麓书社，2004 年，第 681 页。波拉切克注意到清朝内争对其应对鸦片战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启发的角度。见波拉切克：《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李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

复杂的内在关联。

二、借现代范畴看清史连续性

不能简单用后世的认知去理解历史，应该回到历史现场，我相信如今史学界对此基本可有共识。但诸如政治、经济、社会，包括军事、财政等区分和范畴，在现代学术语境下又可助益史学，其最直接的好处是指示我们在理解历史时可以寻求多学科的学术资源。在注意不生搬硬套的前提下，用新的眼光发现被以往的视角所遮蔽的东西，其实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表现。

如果史学家完全沉浸在历史之流中，有可能会和历史人物一样身在庐山之中而不识其“真面目”，后见之明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大优势。一个整全的历史往往让研究者无从下手，现代的区分通过某一领域的聚焦，反而帮助史学家看到具体问题的特殊面貌，和历时性的历史意识相得益彰。比如布罗代尔对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三个层次的区分，使得不同层次的历史演变逻辑能够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这种带有多重声部的大历史，不是从一时一事一人上所能感知的，正有赖后见之明的归纳与提炼。[①] 今天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成绩，往往在于超越了具体历史人物一时所能感知的局部片段，揭示出了更大的经济发展、社会沿革或文化演变。后见之明固然可能妨碍我们对历史现场的感知，却又可提供诸如隔岸观火、高屋建瓴等其他观察的可能性，进而帮助获得更具脉络感的历史认识。

这对清史研究有特殊的重要性。由于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划分这一特殊的人为断裂，今天清史一直存在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脱节的问题。历史毕竟是延续的，如何超越断裂而注意到清史的连续性，便成为未来大有可为的方向，或许也能更充分展现清史研究的独特性。然而，囫囵地讨论这种连续性未免无的放矢，清史研究者贸然跳入连续的历史之流，又有可能被深广的河水所淹没。这时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划分通过聚焦某个具体领域，就像放入了一叶小舟，虽不是流水所本有，却可帮助我们泛于其上，顺流而下。

如太平天国是近代史的一个关键议题，以往对其动摇清朝统治的政治影响、对农民起义的经济成分等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拜上帝教为何起事于广西客民？目前对长期的两广土客问题的社会史背景，研究似尚不充足。太平天国起义一大特色是外来的基督教和广西客民这样的边缘社会群体实现了奇妙的结合（当然后来的扩展是另一个问题）。源于基督教义和入华传教需要而号召停止“此国而憎彼国”的平等关怀，如何与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广西客民对“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的厌恶相结合，激发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呼号？[②]这需要基于对明清以降两广社会变迁的深刻体察来回答。[③]我们诚然仍需注意太平天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成分，但社会史可帮助我们获得一个超越近代史的观察角度，从更长时段理解太平天国的兴起。

又如政治史经典的制度研究，也还可以有拓展余地。总理衙门对晚清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的机构特色亦为学者熟知。[④] 但这也意味着总理衙门除了是近代中国应对“变局”的标志性机构，又和具有清代特色的军机处、进而和清代中央政治运作与权

---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9–23页。较详细的讨论参见该书张芝联“中译本代序”。

②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91–92页。

③ 杨国强：《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④ 总理衙门的相关研究甚多，较晚近的可参见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第一至四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力分配有密切的联系。[①] 一般都认为军机处的设立和清代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有关，而咸丰朝由于时局剧变，其实出现了宗王、御前大臣新起得权，军机处反而拱手无为的新现象，也就是说中央权力此时已有一个微妙的变化。[②] 沿此趋势，咸丰末年总理衙门的设立，既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力量深入的外因影响——奕䜣的得权与此有关，但也不能忽视清朝本身中央权力持续变动的长程内因。特别是辛酉政变既是对咸丰朝中央新权势的一次重新洗牌，又偶然开启了晚清几十年大部分时期没有成年君主或成年君主未能真正集权的变相。这对于政治运行高度依赖君权的清朝而言，无疑有重大影响。而奕䜣作为总理衙门领袖通过政变获得实权，则又极大提高了总理衙门后来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因此，需要将总理衙门放在清朝中央权力运作的脉络中，去理解它在晚清的政治作用和机构角色。至于慈禧权威增大后的甲申政潮和奕譞主政下海军衙门的建立，也可在这一脉络的延长线上进行新的评估。简言之，在注意总理衙门如何应对近代中西变局的同时，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又可观察到一条贯穿清代的权力运作脉络，帮助我们获得超越近代史时限的更长程理解。

再如文化史的研究，中国人对字纸的尊敬是各文明中罕见的。“敬惜字纸”就是一个史料中屡见不鲜，但迄今似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它既是一个文化现象，又和纸的生产、流通、使用的物质史密切相关。至于像惜字局之类的社会组织，更反映这种对文字的特殊态度如何从士绅阶层通过社区向周边民众扩散，可以窥见士与农工商三民的关系。[③] 这一现象在近代因何逐渐消失？和中国人对知识和读书人的态度转变有什么关系？和报纸等新兴媒体的关联又是什么？比如剪报这一不时出现在民国读书人日记上的动作，就体现了对字纸态度乃至阅读习惯的巨大转变；至于再晚些时候有字的报纸被用来糊窗或包装物品，其折射出的文化观念变迁更不可小觑。文化史的眼光恰可串联起从各地的惜字塔、敬字亭到读书人的剪报、民房的报纸糊窗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现象，进而窥探中国人对文化的独特态度及其近代转变。

以上举例讨论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从特定的角度观察历史。特别是针对清史前后断裂的问题，或能提供补偏式的连续眼光。除了这些区分，其实还有很多现代范畴同样能提供新视角，诸如生态、性别、身体等等。这方面研究成果之丰富，读者当有体会。我们用现代范畴理解历史，就像游客用相机拍摄所游玩的菜市场，镜头关注的东西和买菜人是不尽一致的。但也正因此，当买菜人低头忙着挑选蔬果时，游客举起的相机却可能捕捉到前者习焉不察的烟火气。

这样的现代范畴可以给清史研究以启发，这里再举两例。“代际”是一个今天现实中热议的话题，而对此议题的学术研究则似更多偏向民国以降（文学领域尤其丰富）。但“代际”其实是人类社会反复出现的基本现象，清代包括晚清史的研究，都可注意其影响。比如陈旭麓指出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现象，[④] 或可从“代际”的角度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具体言之，许纪霖最近的研究重视近代知识分子的世代，他曾论及戊戌前后两代士人在精神气质特别是与体制关系的差别。[⑤] 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代际的差别往往来自不同代人青少年思想成型时期历史语境的差别，且在同代人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当然这里需要讲究“适度”）。所以某一代人怎么共享青少年时触目和感受的现实境况，一定程度上可帮助我们理解他们如何形成那一代人的政治诉

---

① 关于军机处，最近的研究可见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5 期。

② 同治初年的蒋琦龄指出：“本朝乾隆以来，设立军机处，于是内阁拥虚名，而军机为真宰相……溯自穆彰阿以首揆专政，遇事同列噤不敢言，逮载垣等用事，军机听其指挥，莫敢枝梧，枢垣又拥虚名，虽诸臣不免负恩，亦积威约之渐也。”蒋世玢等点校：《空青水碧斋诗文集》上册《进中兴十二策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6–27 页。

③ 罗威廉对汉口的研究就曾提及当地惜字局的情况。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24–125 页。

④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

⑤ 许纪霖：《戊戌期间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世代交替》，《史林》2019 年第 6 期。

求和思想倾向。如康有为一代人“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①] 而陈天华一代人青年时期看到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这样的差别就可以是理解其政见分歧的一个窗口。[②] 从抽象的意义上说，“代际”其实是“历史”通过历史中的“人”而实现演进的一种方式。由此来看陈旭麓对“新陈代谢”的描述，或许又可生发多一层的学理性理解。

我又关心晚清中西碰撞下的思想史演进，而现代 intelligence（知讯 / 情报）的范畴或可帮助理解当时人对西学的接受。晚近马世嘉的研究指出，清朝其实一直关注边疆邻国的情报，问题在于清朝版图庞大，不同边疆获得的情报常有不同。鸦片战争的转折性在于清朝人意识到需要形成一个统合性的对外政策，《海国图志》等作品为建立这种战略视野起到了词汇标准化等整合性的作用。[③] 在此启发下，我们或许可从情报和战略的角度去理解《海国图志》等著作在清代思想史中的意义。“情报”当然是现代的范畴，但它能提示我们晚清中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非功利的好奇，而是带有搜集情报的目的。汪晖指出《海国图志》首先是一部兵书，[④] 这意味着书中“以西洋人谭西洋”的种种知识，同时亦是军事情报，恰暗合了 intelligence 的双重含义。近代中国人怀着这样的目的了解西方，进而发展出“师夷”的取向，始终带着兵家“知己知彼”式军事对抗的“制夷”目标。这是近代中国人在认识西方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意向。

诸如此类的现代范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现实的关怀和眼光。它们在既有的历史叙事中或许未被充分注意，因而有可能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当然我们利用时仍需把握好“度”，警惕现代意识的过分投射会干扰对历史的理解。那么，“度”在哪里？系统和学理性的提炼当俟诸将来，下文我仍以具体例证来讨论这个问题。

三、对话历史与古今共通性

古今之间纵然有种种差异，但仍有许多方面是人类社会共通的。这或许是我们可以现代范畴对话历史的关键“正当性”。谢健从生态环境史角度揭示了清人对“自然”具有复杂的理解（如其“净化”的意义影响了清朝边疆治理的区隔性政策）。他的写作用意之一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史观，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自然’的发明专属于现代西方，我们也得承认这个‘自然’也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范式……对‘自然’的讨论并非西方人独有”。[⑤] 西方的 nature 有非常特殊之内涵——即使在现代中文里，nature 所表达事物“本质”的那层含义也是所对译的“自然”无法传达的。但谢健仍承认和相信古今中外的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有某些宽泛的共享。在我看来，为这样的互相理解而努力是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类似的，史华兹尽管指出了严复对西学的翻译与原典实有差别，但他最终关心的是严复提出了一个近代以来人类共通的问题：“无限追求富强的浮士德式宗教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甚至是更加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念）的实现，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对我们来说，完全像对他们一样，仍然是一个谜。”[⑥] 这其实是作为现代人（和西方人）的史华兹与过去（和东方）的严复共同分享的问题。共通性帮助我们沟通古今（中外），实现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这或许是“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

① 康有为：《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5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0 页。

② 陈天华：《猛回头》，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2 页。

③ 马世嘉：《破译边疆 · 破解帝国：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罗盛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 年。

④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 2 部《帝国与国家》，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 619–642 页。

⑤ 谢健：《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51 页。

⑥ 本杰明 ·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27 页。

同为人类社会的形态，古、今、中、外的情况一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自其“异”者而观之还是自其“同”者而观之，很多时候其实是观察者角度选取的问题。比如对于儒教是否宗教的争议，黄进兴就主张搁置受基督教影响的宗教定义之纠缠，以诸如空间实践等角度观察儒教的宗教面相。尽管近代以来有众多视儒教非宗教的说法，黄氏指出二者仍有相通的面相，“经典的诠释与‘教义’的真谛，大多为菁英分子的兴趣，普通的信众则以‘效益’与‘灵验’为依归”，只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陷于‘教义’的论辩，而忽略了帝制时期儒教所曾发挥的宗教角色与功能”。[①] 其说成立与否固可争论，其视角却不无价值。它提醒“宗教”范畴未必要受限于既有的定义，可以尝试拓宽其内涵来与历史沟通。由此言之，适度以现代范畴与历史对话，既可获得对历史的新眼光，其实也可借助历史而丰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采取这样的态度，意味着我们在寻找现实和历史的相通性时并不忽略其差异，我们随时准备改进所使用的现代范畴，以达成和历史更好的“沟通”和“对话”。让历史参与到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之中，而非作为解释的对象只能被我们“审讯”和“拷问”，这或许是使用现代区分和范畴的另一个“度”。

对此可举两个例子。我们现在对“舆论”的理解常受“公共空间”等观念，特别是隐藏其后的现代国家—社会二分法的影响。这使得对近代新式报刊的考察，往往关注其如何开启现代舆论。但也正因此，传统士大夫文化中的“清议”和报刊等近代“舆论”的关联，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厘清。其实晚清一份有名的报纸就叫《清议报》，极强地提示了传统“清议”和近代报刊可能存在密切的启承关系。李仁渊曾指出二者的差别：“以前的清议每个人基本上是根据自己的位置发言；然而由传播媒体构筑的空间中，每个人发言的地位原则上平等，空间更开放，发言者的身分地位与其效力未必有直接关联。”[②] 但除却这样的差别，传统清议和新式报刊同具承载读书人发言之功能，其相通性如何？如果不拘泥于现代“舆论”刻意重视独立于政治权力外之特性，那么部分带有“体制内舆论”性质的清议在传统政治—社会生活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并非二分的时代，清议这种“舆论”折射出怎样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就传统清议与现代舆论的关联而言，特别需要重新回到甲午前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之中，考察同光时期“清流”兴起背后的（广义）舆论面相。梁启超、汪康年等新式“报人”或也可看作传统“清议”在新时代的代表，他们直接承继同光时期舆论的某些面相（如强调“通上下之情”），又在甲午后利用报纸作为新的发声机制。这样的研究除了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其实也可以启发对“舆论”更丰富的理解。

再如“国家”这个重要范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既和传统的朝代存在重大不同，却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清代的国家问题便是今天海内外中国史学研究的热点。近代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理想中界限清晰的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空间属性。“新清史”一大问题意识是反思民族国家，着重的便是清朝空间上的多元性。杨念群的最新研究与“新清史”针锋相对，其关于清朝“大一统”问题的讨论也仍聚焦于空间向度。但杨氏还注意到国家问题涉及时间向度的“正统论”，这或许不容忽视。[③] 清代的“国”其实有一种时间性的向度——清朝人所称的“国朝”，对应的是汉、唐、宋、明等“前朝”。由此言之，如何处理“朝代”和“国家”的关系，或许也是理解中国国家特性的重要问题。

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梁启超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其《新史学》批评传统史学如“二十四姓之家谱”，“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④] 在在提示了现代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其实和传

---

① 黄进兴：《研究儒教的反思》，《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13–214 页。

②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稻乡出版社，2013 年，第 369 页。

③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代“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

④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 1 册《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 页。

统具有时间性意义的“朝代”密切相关。若不拘执于必须以空间来定义“国家”，或可以说，中国国家一大特性是还带有“朝代”的时间性意义。就国家作为一个人群的政治主体而言，现代国家的主体性主要是空间性的，今人在和他国的比照中认知“我国”，其参照系是空间上列国并立的国际秩序。古代中国的政治主体性既有在天下和四夷中定位“中华”的空间和文化属性，但或许还具有时间性，古人在和前朝的对比中认知“我朝”，其参照系是杨联陞的名文《朝代间的比赛》所描绘那种时间上的朝代比照。① 在这一意义上，传统的朝代“正统论”可以被看作一种广义上的“国家论”。

进而言之，民族国家叙事固可如杜赞奇担忧的那般干扰到对历史的理解，② 这对于现代印度这样的国家尤然；但对于国家观念本就含有时间性的中国而言，历史和国家的缠绕可能反而符合中国人一直以来的认知。一方面，这意味着通过历史对国家进行叙述在中国有漫长而持续的传统，不待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介入后始然（当然具体叙述方式很不相同）。历史对于中国之为“国”具有本质性的意义——比如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说固然借鉴了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但又仍在传统的延长线上。③ 从朝代赓续的历时性上，我们更能理解和确定为何清朝这样带有空间多元属性的王朝是属于中国。另一方面，朝代之“国家”对于中国的历史和史学又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像“二十四姓之家谱”，反而是看到了以“朝代”为纲来引领历史叙述的特点。这又意味着今人在考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同时，不能矫枉过正地忽略中国历史叙述传统的一大特性本就在和广义的“国家”难舍难分。碍于篇幅，这里只能点到即止。但中国在民族国家的躯壳下或还暗承着传统“朝代”的时间性灵魂，因此既和美国、印度等同为现代国家，又有其特异性。这点或可帮助我们发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为何对国家有独特的看法，进而拓展“国家”的现代内涵。

总之，如果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④ 今人都是在用当前的词汇和思维方式和古人进行着交谈。不仅今人如此，《春秋》之笔削其实就可看作身处周末的孔子在和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进行着对话。甚至《论语》记载《诗》《书》是子所雅言，以往多注意孔子不用鲁语而用雅言正音来诵读或传授。但《诗》中有不同国风而可能带有方言，《书》是佶屈聱牙的书面文字，它们是否都可以被雅言？还是说当孔子在雅言时，其实已经是以春秋时的“普通话”翻译了《诗》《书》——类比于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若然，则孔子之“作”与“述”，皆是在以其“现在”和“过去”进行对话。当然，现代的区分和范畴不需要像经那样是神圣的，我们需对它们时刻保持警惕和反思。但如果像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是人思考世界的界线，⑤ 则现代的区分和范畴又是我们今天的一种基本语言，帮助我们把历史纳入现代的生活世界中，帮助我们在其中理解历史。让历史和我们今天的语言“适度”地紧密互动，能使历史不是像展览品一样供放在博物馆里，而可以在现实中对其他问题与学术思考形成影响。这或许是除了探索历史真相之外，史学另一个重要的经世目的。

---

① 杨联陞：《朝代间的比赛》，《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 年，第 30–42 页。

②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③ 章太炎：《序种姓上》，朱维铮点校：《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69 页。

④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15 页。

⑤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0 页。